

# 女性视域

西方女性主义与中国文学女性话语

于东晔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I206  
Y709.1

于英  
晔  
著

8

# 女性视域

西方女性主义与中国

话语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女性视域:西方女性主义与中国文学女性话语/于东晔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9

ISBN 7-5004-5803-7

I. 女… II. 于… III. 西方国家—女性主义—影响—文学语言—研究—中国 IV. I2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07669 号

责任编辑 张晓颐  
特约编辑 符佳  
责任校对 李莉  
封面设计 王华  
版式设计 李建

---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电话 010-84029450(邮购)

网址 <http://www.csspw.cn>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新魏印刷厂

装订 丰华装订厂

版次 2006 年 9 月第 1 版

印次 2006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9.375

插页 2

字数 225 千字

定价 22.00 元

---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序 言

现当代文学专业的导师们都面对一个事实，大多数女研究生都热衷于做女性主义文学的选题，再有就是不断重复的张爱玲研究。于东晔要研究“女性主义文学理论在中国”，这也是顺理成章的。

而且我认为，也许于东晔是最适合研究女性主义文学的。

女性主义文学理论虽然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在中国就有介绍，但直至 90 年代才悄然为世瞩目。1995 年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尽管由于中国国情女权主义只是喧闹一时很快就归于沉寂，但已经边缘化的中国文学却为女性主义留下一片沃土。我们甚至可以说，设若没有女性主义理论催发下的女性文学写作，整个 90 年代中国当代文学将会何等苍白与黯然失色。从那时起，“女性自己的屋子”“男性霸权文化话语”“第二性”“菲勒斯中心主义”“女性阅读”“身体写作”等语词被一些评论文章频频使用。这是近几十年来中国文化界的一个特点，大凡一种新的理论、潮流、势头要来临，总是新名词、新术语满天飞、到处套，不管是否理解、是否合适，就表示这已是“弄潮儿”了。而女性主义理论提出，人类过去的文化史都是“男性霸权文化”“阳性崇拜”“父权制”的文化产物，例如举出“history”、“chairman”等庄重的词汇都与男性有关，而中国学者更言之凿凿，因为汉语

中不少贬义词以“女”字旁相随。女性主义文学就是要重新建构女性文学自己的空间，重建女性话语系统，而女性主义的话语的建构就起于解构与颠覆位于中心地位的男权文化及其话语。

这是一种对文化传统的反叛与颠覆，它的先锋性与革命性解放了数千年被压抑的女性自我一性别意识。女性自我一性别意识的觉醒，唤醒了女性正视自己的身体与身体写作欲望的强烈骚动，它的一大贡献是为90年代以来处于转换方向期的中国文学出色地描绘了一片独放异彩的风景。我在多处提出，文学发展的历史，就是“人”的观念的发展史，就是我们对“人”不断发现的历史。对女性的性别发现，女性性别写作的成功，是20世纪90年代中国文学不可忽视的贡献。

但是理论呢，除了全面搬运些西方女性同伴的理论，不断地重述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尖锐声音外，几乎没有自己的建树。这也是最近20多年来中国文学理论界的通病。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文学新方法论，输入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继而结构主义、叙述学、形式主义、新批评，还有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后殖民理论与后现代，等等，凡西方先锋理论，都被匆匆忙忙介绍进中国，介绍者自己并不了然，以翻译代替研究。翻译西方理论著作当然是必需的，但如何运用于中国文化，却需要结合中国文化本土实际进行探索与创新。出于对长期闭关锁国文化状态的反抗、叛逆与急切的求变心态，盲目的崇洋心理同时表现在文学理论的创新思路。最近20多年来在中国照搬西方新潮理论的结果是，各种西方新方法都轮番在中国文坛匆匆走了一遍，但是用于中国文化自身的中国本土文学理论至今仍付诸阙如，我们的文学理论现状是一块破碎的七巧板，各种理论被零敲碎打凑在一处，就是没有自成一体的中国自己的文学理论，我们的文学理论没有自己的声音。女性主义文学理论也是如此，只是不断地

照搬西方女性主义理论那几句经典表述，经典表述固然重要，但鹦鹉学舌终究显示思考的贫乏。例如，西方女性主义理论认为，“温柔”、“娴静”、“柔顺”、“优美”、“细腻”等这些对女性的描述与赞美，都是根据男性对女性的需要而创造的，是男人心目中的好女人的标准，它不是女性本身的需求，“是语词在说我们，而不是我们在说语词”，就如“是衣服在穿我们，而不是我们在穿衣服”。于是中国的女性主义批评就以此为自己的视角与解剖刀，将两千年的中国文学史稀里哗啦解剖了一番，都是男权文化的产物，历来认为中国文学史上许多优美的女性形象却原来都是按照男性的需求被创造的，不是女性自身的要求。有的女作家写出了自己独创性的作品，她的作品中的女性自我形象是这位作家心灵独创性的产物，但是评论家却将作家个人的艺术独特性放大为女性主义的普泛性。为了解构“温柔”、“娴静”、“柔顺”、“优美”、“细腻”这些男人强加给女性的附加物，于是骚动、自虐、孤独、冷漠、怪异、“寡妇情结”、歇斯底里地与男人对抗、成了被某些评论叫好的女性属性。“无私”、“奉献”、“牺牲”、“慈祥”等传统中的中国母亲的伟大形象，被粗俗、平庸、自私、泼辣去涂抹掉。既然女性主义主要是一种性别理论，“身体写作”的哄然而起引导女性写作以描写与体验“性”为主，女性的隐秘性被敞开着、放大着大写特写。文明的理念都要求保护个人私密与隐秘性，但是为了“颠覆”为了“反叛”、为了表现自己，堂皇地敞开女性的性隐秘被大声叫好着，成了商业市场上满足窥视欲获得女性性信息、性隐秘的图书商品，而此次文化商品却不是男性想象女性而是女性自己提供“身体—欲望写作”沦为社会性文化消费品。我不知道这样的女性文化想象，能获得多少女性的欢迎与认同？

但是于东晔不是这样。她也从事女性主义文学理论研究，她

已是女性文学研究行列中的一员，她身为女性和其他女性研究者一样关注由女性性别引出的一系列文学理论与女性实践问题。但是她不盲从那些喧嚣、流行的女性主义理论。在博士论文课题研究的过程中，于东晔多次向我谈起她的见解，她不赞同流行的女性主义理论的一些极端观点，女人还是要成为女人。于东晔是阳光的，她真诚、温顺、有爱心，她懂得感恩父母、恩爱丈夫、尊敬老师、关爱他人，她懂得责任感。特别是她的善良、纯真、亲和，使认识她的人都感到她所具有的一种美德，感到一个具有优雅的文学素养与高层次文化教养的女性的人格和风格。她的这些心理素质与想法，就是我认为于东晔是最适合做女性主义研究的原因。她对女性主义的研究不是琢磨着让女性如何与男人壁垒对抗，如何地淘洗掉中国女性的人性与优良品质，如何地变得乖戾与不近人情。她的研究是思考在今日中国社会中女人如何更完美地成为女人，理想的女性意识是什么。女性研究的目的是为了使女人充分地获得完美人性，展示人性的光辉。她以理性的思考关注着两性文化的和谐共建，以一个知识女性的社会责任感关心大众文化的现状与前景。她认为，“真正的女性话语并不意味着在意识形态领域和男性相对抗的文化姿态，也绝不是颠覆了男权话语中心之后再建一个话语中心，而是为了唤醒人们对历史和现实中性别文化残缺的警醒，使人类的文化实践能更有益于两性的和谐生存”。这是富有智慧的现代性思考。

于东晔把这当作自己的一项庄重的事业来完成。她为此付出了艰辛。整整三个寒暑，于东晔在苏州大学简陋的宿舍与图书馆中苦读，她阅读了所有相关的资料，做了大量的笔记。提纲与初稿被反复修改。女博士生毕竟不多，而且寒窗苦读与长夜写作似对女性显得格外“残忍”。她在苏大校园里应该还是比较孤独的。但是她孜孜以求，一点不悔。她又是一个幸运者和快乐者，她终

于表述了自己的思考，获得了答辩委员会专家的赞赏。她赢得了自己的成功。

两年于东晔通过的博士论文名为《女性主义文学理论在中国》。她回到徐州师范大学后，边教学边修改、充实论文。她接受我的建议，将改定的论著命名为《女性视域》。这是于东晔的第一部著作。我希望于东晔在将来的研究中更充分、更大胆地，也是更理性、更智慧地发表自己对女性主义的独特见解，以自己的“女性视域”参与到现代中国的女性主义文学理论建构中去。

面对女士研究女性主义，我本无资格说三道四，按照有人所说男士“免开尊口”。但是为我指导的博士论文写序，在我的历届毕业的博士生中已成惯例。于东晔是我近几年来指导的博士中，第十位出版博士论文专著的。看到新人成长总是很兴奋，不免写下上述直陈之言，欠当之处，还请谅解。是为序。

朱栋霖



# 目 录

序言 .....	朱栋霖 (1)
绪论 文学是有性别的 .....	(1)
第一章 中国的接受语境与译介情况 .....	(18)
一 接受语境 .....	(19)
1. 中国传统文化对女性的角色规定 .....	(19)
2. 特定的时代可能性 .....	(27)
3. 与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共鸣 .....	(33)
二 译介情况 .....	(35)
第二章 女性主义批评话语 .....	(57)
一 女性主义社会历史批评 .....	(64)
二 女性主义精神分析学批评 .....	(84)
三 女性主义原型批评 .....	(106)
四 女性主义叙事学批评 .....	(120)
五 女性主义后殖民理论批评 .....	(134)
小结 .....	(149)

<b>第三章 女性主义创作话语</b> ·····	(153)
一 新时期以来女性写作的发展阶段·····	(156)
1. 女性写作的少女时代·····	(160)
2. 女性写作的成年时代·····	(167)
3. 女性写作的更年期时代·····	(179)
4. 女性写作向男权文化的回归·····	(188)
二 女性主义烛照下的人物形象塑造·····	(197)
1. 中国文学传统中的女性形象·····	(198)
2. 女性写作的“自我书写”·····	(209)
3. 女性写作的“书写男性”·····	(224)
三 女性视点的介入对叙事及修辞的影响·····	(232)
小结·····	(248)
<b>第四章 女性话语：现在与未来</b> ·····	(250)
一 模仿与反叛同在·····	(253)
二 发觉本土的自我·····	(260)
三 终极追问：走向哪里·····	(269)
<b>参考文献</b> ·····	(281)
<b>后记</b> ·····	(288)

## 绪 论

# 文学是有性别的

20世纪80年代，随着社会政治和经济的改革开放，中国当代文学第一次以开放的心态把自己作为当代世界文学的一部分来审视自身，翻译介绍了西方近百年来各种不同时期不同国别的文艺思潮及流派，开拓了理论视野，更新了文学观念。但同时无论创作还是批评，都表现出了相当严重的浮躁学风，表现在用十几年的时间把西方近百年来各种文学流派做了浮光掠影式的介绍，新理论新方法层出不穷，但每一种方法或理论都是热得快也冷得快，使得新理论和新方法缺乏吸收、消化、沉淀以转变成自身营养的时间和过程。夹杂在理论热和方法论热衷译介到中国的女性主义文学理论的命运似乎稍有不同，它经历了一个慢热的过程：1981年就有介绍性的文章，但没有引起应有的关注。翻译介绍的过程中有接受也有抵触，但都处在温和的不引人注目的状态。直到1995年由于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的召开，由于官方操作和商业利益的刺激，才热闹一时。虽说热闹过后也很快走向低潮，但却成为一股强有力的暗流，会时不时地显示出它的存在和力量，这使得它显现出了和其他的曾经热极一时的理论和方法的不同之处。

女性主义文学理论另一与众不同之处在于它的性别色彩。这一性别色彩不仅仅体现在它的命名上，更体现在它的传播和接受

过程中所体现出的鲜明的性别鸿沟和因此而生的对立。

中国几千年的文学史，一直是男性书写的历史。这其中，偶尔也有女性发出的声音。但是，按照女性主义者的观点，身为女性并不一定会像女人那样说话，她们可能只是在说男人的话。整个古典时期，女性文学创作主要是男性话语的一种点缀，喜怒哀乐皆系于男性身上，没有自己的独立意志。“五四”时期，一些接受了新式教育的女子，从禁锢她们的家庭中走出来，参与到新文化的建设之中。这样，中国第一次诞生了一个女性作家群。这些新时代的女性作家的创作不再仅仅是为了消遣时光或排忧解难，相反，她们的写作直接面向社会，希望对社会的改造尽一份力。而且，无论在主题上还是话语上，这些作品都一改古典时代女性创作或多或少的以男性为倾诉对象的痕迹。

当然，“五四”女性作家的崛起主要传达的还是政治上的反封建意义，它还没有来得及从性别角色的角度来反思自身。而且由于漫长的封建文化的历史积淀，她们的作品在反抗“三从四德”、反抗“女子无才便是德”，但骨子里还是无法摆脱对男权中心意识的臣服与迎合。因此，她们所塑造的正面女性形象往往具有容忍、牺牲、温柔等一类天性，随时随地准备充当失意男人的避风港。这仍然是以男性为中心缺乏自主意识的表现。

50年代至70年代末期，由于“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使原本就不是很强烈的女性作家的性别意识变得更加模糊起来。那时女性作家的作品，仅仅能够从文笔轻淡、行文较具抒情性等这类修辞风格的角度，将它们同男性作家的作品区别开来，这些作品没有体现出多少女性对世界的独特感受和看法。况且，这一时期文学中的女性连外在形象都在向男性靠拢，更别提女性独立

自主的自我意识了。<sup>①</sup>“文化大革命”中，这一趋向到达极致。当创作中已经忽视了女性的性别意识，批评界就更不可能有从女性意识角度来进行批评的文本了。

甚至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很长一段时期内，众多的女性作家仍然未能以鲜明的性别意识投入写作，并且出于对“文革”中女性性别特点被极度抹杀的“历史控诉和反思”<sup>②</sup>，一些女性作家的创作甚至对男权主义的复归给予了一定的认可和配合。<sup>③</sup>

张洁的《方舟》被认为是第一篇女性小说文本，尽管“它是自发的、本能的、抗议的，是长期压抑的内心情感的爆发”，但它的意义在于“标志着文学写作中女性意识的形成”<sup>④</sup>。同一时期的张辛欣的《在同一地平线上》、《我在哪儿错过了你》都被看成是女性文学的萌发之作，是因为这几部作品，开始企图用“分辨”的眼光考察两性在社会、情感、心理和伦理等方面的关系，它们还谈不上完全是以女性为“本位”的眼光，但它至少意识到要对两性加以“分辨”。这种眼光的出现，显然得力于80年代后

① 十七年和“文革”中，主流意识形态推崇的女性形象是大寨“铁姑娘”，在文学作品中相应的推崇的是雄性化的女英雄形象，如王汶石的《黑凤》所叙述的是一位“干劲冲天”的叫黑凤的姑娘在“大跃进”时期如何闯入男性劳动世界的故事，着力突出女主人公和男人一样的体力和强者姿态；《新结识的伙伴》中的张腊月在外形、言辞方面也体现出浓厚的男性特征；李准的《李双双小传》中的李双双，冯德英的《苦菜花》中的娟子等形象身上，也都或多或少地流露出男性化倾向。

② 陈惠芬：《神话的窥破》，第5页，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年版。

③ 如航鹰的《东方女性》通过女性的自省强调恰是由于妻子自身疏忽了丈夫的欲望要求而使他“犯了错误”，并以宽宏对待一切；戴晴的《飞过来》中的妻子认可和同情丈夫的放浪不羁不过是“逢场作戏”……这些都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在男权、包括男性的欲望原则复活的时候，女性实际所遭遇的婚姻情感危机，然而作为一种“默契”和配合，她们却不约而同地为男性的欲望要求、逢场作戏而开脱。见《神话的窥破》，第22页。

④ 王光明：《女性文学：告别1995》，《天津社会科学》1996年第6期。

期逐渐强劲的个性化社会意识；如同个人开始更多地从“自我”反思和探求存在的价值一样，女性作家的写作也渐渐脱离 50 年代至 70 年代末的“无性别”意识，重新对性别事实变得敏感而关切，并将其付诸叙事实践，写出以思考两性关系为主旨的作品。富有意味的是，当女性作家摆脱原有的性别角色禁锢，对两性关系的本质进行重新思考和探索时，却没有一个男性作家把“两性关系”作为他们的关注对象，他们笔下的两性关系的实质依然是男居主女居辅，女性为男性无私奉献和牺牲。男性作家的这种迟钝和失察是符合男性作家所据有的性别优越地位的。这时候的男性作家，经常对女性作家在作品中表现出来的角色焦虑、自我丧失等痛苦表示难以理解。我们可以举王蒙为例，当代作家中，尤其在 80 年代初期，王蒙可以说是观念比较新潮、民主思想比较浓厚的一位，即使开明如他，对张辛欣在《在同一地平线上》中表现出来的女性角色焦虑也不以为然：“描写女主人公为买一点便宜而又好吃的菜而逛菜市场的心情，贫困、空虚、卑微、可怜，这样的生活简直令人窒息。写得精彩则精彩矣，其说服力却不免令人疑惑，希图买价廉物美的东西并为此而花一些时间，这不是很合乎‘普遍的人性’的生活真实吗？这究竟值得那么痛心吗？”<sup>①</sup> 因性别立场而导致的分歧显而易见：作为既得利益群体中的一员，王蒙和绝大部分中国男人一样，习惯了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家庭模式，即他们只重视女性的生理角色而忽视女性的社会角色。男人们在外面奋斗是天经地义，而女人们呢？工作不过是一种生存需要，她们的全部世界，仍然应该是孩子、丈夫、家庭。如果一位女性不是仅仅把工作作为谋生手段，而是作为一项事业去追求，那么她不但得不到来自丈夫、家庭的

---

<sup>①</sup> 王蒙：《漫话几个作者和他们的作品》，《文艺研究》1983 年第 1 期。

支持，反而会因忙于事业对家务有所疏忽而招致埋怨。男人们不愿也不肯去正视女性所面对的事业、家庭的双重压力，更不愿也不肯主动去分担。在物质生活水平还很低下、家务劳动社会化程度普遍偏低的条件下，繁重的家务已经是女性的一项沉重负担，此时，由于经济的拮据，女性还要用大量的时间精力为省钱而盘算，这势必要占用她投入到事业上的时间和精力，有事业心的女性抱怨几句，应该说是一种再正常不过的反映，而王蒙的评论，只能说明“中国长期处在男尊女卑的传统思想的束缚下，即使是很开明的男性，也会在思想深处，窝藏着许多思想垃圾”<sup>①</sup>。

到此时，由于女作家们的主体意识还不是很强烈，男女作家在性别观念上的分野还是自发的、本能的，还是无意识的。从80年代中期开始，随着西方女性主义文学理论的传入和广泛被接受，这种分野就越来越自觉，越来越分明，对立也越发尖锐。

语义学批评的代表人物瑞恰兹认为，文学作品是它的文学特性、想象和语言三者的结合，它的意义不仅涉及它的语法结构和逻辑结构，而且也涉及对它的联想。不过，文学作品的语词、句子所唤起的意义是相对稳定的，因为语法规则和逻辑是比较稳定的。而对文学作品的联想所唤起的意义是不稳定的。由于不同的人的主体条件、所处环境各不相同，因此这种联想意义也就因人而异。不仅如此，即使同一个人，由于时间、地点乃至心境的变化，也会造成这种联想意义的变化。<sup>②</sup> 在对西方女性主义文学理论的接受中，十分典型地表现出了因主体条件（性别）的不同，

---

① 范伯群：《中国现代文学的性别意识·序》，见李玲著《中国现代文学的性别意识》，第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5月版。

② 朱立元主编：《当代西方文艺理论》，第96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而导致的联想意义的因人而异。

80年代开始，在对西方女性主义文学理论的译介、运用过程中，主将绝大部分是女性，她们对这一理论表现出了天然的情感与理智的认同。我们可以列出一长串的名字：朱虹、李小江、张京媛、戴锦华、刘思谦、陈志红、王绯、盛英、荒林、徐坤、陈顺馨、李玲、西慧玲……女性主义文学理论不是她们专业的全部，但是，女性主义是她们的一个基本立场，从她们的文章中，我们总是能或清晰或模糊的感受到她们的女性主义基点。对她们来说，女性主义绝对不仅仅是一种方法，像80年代“方法论”热衷的任何一种方法一样，只是作为一种工具使用，可以招之即来，挥之则去。女性主义已经成为她们生命的一部分，在其中，她们投入的不仅仅是学识，还有激情和生命体验。

80年代初期，在中国这个封建意识依然浓厚，对女性的束缚依然多多的情境下，选择女性主义，宣布自己是女性主义者，是承受着一定的压力的。直至1992年，戴锦华在参加一个国际学术会议时，主持人介绍她说“这是中国唯一一个‘亮牌子’的女性主义者”<sup>①</sup>，这种强调就说明当时没有多少人愿意明确而公开地承认自己持有女性主义立场。这一方面是由于新时期之初，女性自身的性别意识和性别自觉还相对低下，另一方面，这个时期女性知识分子和男性知识分子群体一样，更重视一些重大的政治命题，如对“文革”的反思、人道主义的启蒙等等，对女性具有革命意义的性别自觉意识还没有进入她们的理性层面。

尽管在80年代中后期，女性学已粗具规模，但女性主义的理论还是未被人们充分理解，甚至还有很多误解，包括女性和部分从事女性研究的人，对女性主义，准确地说是对“女权主义”

---

<sup>①</sup> 戴锦华：《犹在镜中》，第153页，知识出版社1999年版。



采取了漠视甚至是敌视的态度。当时的人们对女权主义有着某种程度的反感和厌恶，可能是因为，从字面上理解，女权主义似乎是关乎权力之争，而刚刚从“文革”的噩梦中醒来的中国人几乎是本能地厌恶一切争权夺利的事。还有的是对女权主义的误解和误读，包括女权主义就是霸权主义、女性优越主义，认为女人优于男人，女人要压倒男人，女人要接替男人的主人地位成为新的霸主等等。另外，由于国外60年代的女权主义运动中有一些过激的行动和口号，使得对西方尤其是西方的女权主义运动所知甚少的国人更对女权主义带有一种恶意的偏见，即认定女权主义等同于“性变态”或滥交，使女权主义带有道德上肮脏、邪恶的意味。在知识界，一种相对普遍的误读是将女性主义简单地等同于妇女解放运动，等同于官方的“男女都一样”，在此前提下，许多人认为，中国不需要这样的运动，理由是中国妇女已经充分解放了。

正是由于以上的种种误解，张京媛在《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中对选择用女性主义还是女权主义做了很仔细的辨析：“国内常见的两个词是‘女权主义’和‘女性主义’。显而易见，两个说法的差异在于‘权’与‘性’。女权/女性主义就是研究性别和权力的学说。当然如果汉字里要有一个包括权和性的词就好了，但是汉语中却没有这个综合词，我们只能选择其中一个。”<sup>①</sup>有研究者认为，无论是“女权主义”，还是“女性主义”，都有片面性和局限性。前者太求政治色彩，容易掩去其他，而后者则性别意味太浓，无法传达英文原词在发展中日益加重的

---

<sup>①</sup> 张京媛：《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前言》，第4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